



▶元代“寄寄老人”的灰陶象尊。

▶元代“寄寄老人”的灰陶牛尊。



寄身乱世

“寄寄老人”（约1225年—1300年），为金末元初极具代表性的黑陶工艺大师，真实姓名无确切正史记载，学界据元代文人题跋及文物款识考证，其本姓陈，自号“寄寄老人”“寄寄翁”，亦有“长安脾地寄寄老人”之款识传世，后世多以“甄陶师”“研师”称之，是元代匠籍制度下，底层匠人凭绝世技艺名留后世的典型人物。

“寄寄老人”原籍南宋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，出身江南民间制陶世家，自幼承袭家学，深谙江南细腻制陶之法。他生于南宋嘉定年间，彼时宋金对峙，北方战乱频仍，金哀宗天兴三年（1234年）金国覆灭，蒙元军队入主中原，南北局势剧烈动荡，青壮年流民北迁者不计其数。“寄寄老人”也在这一时期，自江南流徙，先后辗转晋南汾渭流域，最终定居关中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自此以制陶为终身之业，长安也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核心之地。其自号“寄寄”，绝非随意取之，而是一生际遇的真实写照：一为身世之寄，乱世飘零，背井离乡，寄身于北方异乡，无有定所；二为心志之寄，摒弃世俗纷扰，寄情于陶土泥火，以仿古制器为精神寄托，尽

乱乱世匠人的孤高与坚守。

元代建立后，朝廷推行严苛的诸色户籍与匠籍世袭制度，将各类工匠编入专项户籍，世代承袭技艺，不得擅自脱籍改业，匠人身份低微，人身依附于官府与贵族。但元代大一统的格局，打破了南北地域与民族文化的壁垒，关中地区成为汉、蒙古、色目等多民族杂居之地，文化、技艺交流空前频繁，这为“寄寄老人”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土壤。他虽身处匠籍，却凭借精湛绝伦的仿古黑陶技艺，得到元代上层贵族与文人士大夫的赏识。元初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王恽在《秋涧集》中，专门撰文题赠“寄寄老人”，盛赞其所制陶砚“坚润精绝，堪比铜雀古瓦”；金末元初文坛名士段成己亦有诗咏其陶艺，足见其在当时文坛与贵族圈层的声誉之隆。

“寄寄老人”一生专攻仿古黑陶礼器与实用陶具，创作恪守中原商周青铜礼器形制，同时融入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与工艺特质，烧制器物涵盖鼎、簋、豆、尊、砚、人物俑等诸多品类，其作品底部多阴刻楷书“寄寄老人”款识，字体端庄规整，刀痕流畅自然，成为学界鉴定其作品的核心依据。目前存世带款真品仅40余件，多出土于西安耿氏家族墓、河南浥池元墓等元代高等级贵族墓葬，海南省博物馆藏灰陶象尊、牛尊，更是其作品流传至今的实物见证。

“寄寄老人”一生未入仕途，无正史传记记载，终老于长安，约元成宗大德年间辞世。他以一介底层匠人之身，亲历金元易代的乱世风云，见证南北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，将一生心力倾注于泥火之间，其作品既是元代制陶工艺的巅峰，更是多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实物见证，在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史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，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明代青花烛台



该青花烛台高约29.8厘米，器身自下而上分别装饰回纹、折枝花纹、波涛纹、缠枝菊纹、锦地回纹和蕉叶纹，纹饰繁缛，线条流畅。

该烛台器形端庄稳重，胎质坚实细腻，青花发色秀丽，构图丰富多采，为明永乐青花烛台中的珍品。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

盆中清供 案头风雅



素三彩缠枝莲纹长方水仙盆。

文房器物中，盆盂一类常因实用而掩其美。水仙盆，顾名思义，是浸养水仙之器，然而，当目光落在这件素三彩缠枝莲纹长方水仙盆上时，你会发现，实用与审美在此达到了微妙的平衡。

初看，是它的形制。长方，口沿微撇，腹壁斜收，底承四足，线条干净利落。这类器型，自宋代便已流行，明末清初的文人尤其偏爱。它不张扬，却自有风骨，搁在书斋案头，既不夺书画之韵，又不喧宾夺主。尺寸也讲究，盈盈一握，单手可托，放在窗台或琴桌旁，恰到好处。

再看，是它的色彩。素三彩，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误解。所谓“素”，并非素净无华，而是指以黄、绿、紫、白等釉彩为主，不用红色。这种色彩体系，始于明代成化，盛于清朝康熙，这件水仙盆便是典型。它的底色是淡雅的米白釉，温润如玉；其上，用深绿、浅绿、鹅黄、茄紫绘出缠枝莲纹，没有大红大绿的喧闹，反而透出一种沉着、内敛的华贵。尤其是那抹紫色，深沉如熟透的茄子，古人称之为“茄皮紫”，是素三彩中极难烧成的色调。

纹饰也值得细说。缠枝莲，是传统吉祥纹样，枝蔓缠绕，连绵不绝，寓意生生不息。但在这件盆上，匠人的处理很见功力。莲花并非对称排列的图案，而是随枝蔓自然流转，疏密有致，仿佛能看见画笔在坯胎上行走的轨迹，气韵连贯。叶片翻卷，花瓣舒展，虽是平面纹饰，却有立体的生机。更难得的是，缠枝纹布满器身，却不觉拥挤，留白恰到好处地托出主体。

最见功力的是它的工艺。素三彩属于低温彩釉，需要两次烧成。先高温烧出素胎，再在胎上绘彩，最后入窑低温焙烧。每一步都充满变数，釉彩的厚薄、窑温的高低，都会影响最终的发色。比如那抹茄皮紫，极易烧“花”或发色不正。而在这件盆上，紫色匀净，与黄、绿搭配和谐，可见当年匠人手艺之精。（据《联谊报》）

中华融合史的缩影，寄寄老人——泥火虽微铸中华

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开启了多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全新格局。“寄寄老人”作为金元易代之际关中地区代表性黑陶匠人，以仿古礼器与陶塑为载体，将中原礼乐传统、草原游牧文化、江南审美意趣熔于一炉，其作品既是元代工艺高峰，也是民族融合



“寄寄老人”款陶爵。

合流工艺

存世的“寄寄老人”款黑陶制品多以泥质灰黑陶为胎，通体不施釉彩，采用渗碳磨光工艺，不施釉而呈玄色莹润质感，是中原制陶传统与北方游牧民族烧造技术结合的典范。

“寄寄老人”的作品原料，选用关中地区细腻黏土，经淘洗、揉炼、陈腐，胎质致密纯净，承袭龙山文化黑陶与商周灰陶的中原技术脉络。

烧制环节，采用低温渗碳，以马粪为燃料产生浓烟，使碳粒渗入胎体形成乌黑表层，再经反复打磨，呈现“黑如漆、明如镜、坚如石”的效果。

“寄寄老人”的器物成型以模制结合手工精塑，大件礼器分段模制、拼接无痕，细节处刀刻利落，兼具中原礼器的规整性与草原雕塑的粗犷张力。这种技术互补，正是元代多民族制陶技艺互通的直接体现，

也让黑陶从民间日用上升为兼具礼仪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型器物。

海南省博物馆馆藏元代灰陶象尊、元代灰陶牛尊以写实手法塑造瑞兽形象，既承载中原农耕礼祭、牛祀社稷的礼乐内涵，又暗合蒙古民族对牲畜的尊崇与自然崇拜。器物周身饰简洁革带纹，简化了中原青铜器的繁复纹饰，融入草原游牧器物的装饰语言，体现去繁就简、兼容并蓄的融合审美。这种创作逻辑，正是元代统治者推行“各依本俗”政策，多民族信仰、习俗和谐共存的艺术表达。

元代灰陶象尊、元代灰陶牛尊两件国宝，不仅是流失回归的民族瑰宝，更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理解元代民族融合的物质文化之门。它们证明：元代的文化整合并非单向同化，而是各民族文化在坚守自身根脉的基础上互鉴共生，最终汇聚为更具包容性的中华文明。

款识交融

“寄寄老人”款识作品多以楷书阴刻“寄寄老人”款，字体端庄流畅，承袭中原书法传统，以固定款识确立个人品牌，体现汉族匠人对工艺署名传统的坚守。在多民族共居的元代，匠人以汉字款识标识作品，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体现，也说明汉文化在工艺领域的主流地位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断。其作为海外追索回归文物，其跨地域、跨国界的流转历程，进一步证明元代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强大凝聚力与辐射力，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连续性与包容性。

“寄寄老人”以一介民间工匠之心，以“寄寄”之怀，将人生际遇、时代风云、文化信仰熔铸于玄色陶土之中，造就了“粹然含金玉之质”的黑陶艺术，成为元代工艺史上的孤标高士。

“寄寄老人”的黑陶艺术并非简单技艺叠加，而是中原礼乐传统、蒙古游牧文化、南北地域审美的深度熔铸，泥火虽微，可铸大器，族群各异，共铸中华。（据《海南日报》）



“寄寄老人”款陶匱。

耳杯里的流觞情

暮春三月，上巳良辰，文人雅士列坐溪畔，酒杯随水轻泛，大家吟诗作赋、畅叙幽情，便有了千古流传的曲水流觞雅事，承载着古人对春日的赞颂、对生活的热爱。溪水中那随波而行的独特酒杯，就是曲水流觞的“觞”，又名“羽觞”，也叫“耳杯”。其通常呈椭圆形，杯身如船，能漂浮于水，杯子较浅，口部左右长沿均有出耳，形如鸟的双翼。双耳的设计不仅美观，也便于人双手把持、端送饮用，并能够在宴席中更好地传递。

《楚辞》有云：“瑶浆蜜勺，实羽觞也。”荆州博物馆收藏的西汉彩绘三鱼纹漆耳杯，构图简洁、色彩明快，充满灵动悠然的楚地风韵。此杯出土于湖北荆州凤凰山汉墓，以木为胎，内外髹漆，古朴雅致。杯内以黑漆为地，用朱、金、黄诸色精细描绘，内底中心饰四叶纹，色彩相间，柔和悦目。三条鲤鱼环绕四周，首尾相随，灵动鲜活。鱼

鳞以金彩细细勾勒，鱼旁点缀圆点纹，恰似水中气泡，栩栩如生。鱼与“余”谐音，三鱼环绕，暗含年年有余、富足安康的美好祝愿。曲水之上，执此漆杯，杯中酒清，杯底



唐代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。

鱼游，饮酒之时如见清溪鱼乐，正应了曲水流觞的自在与欢愉，楚风浪漫，尽在其中。

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汉白玉耳杯，1958年出土于吉林集安，形制小巧，盈盈可握。器物作椭圆形，两侧双耳微微上翘，形似飞鸟展翼，是汉代羽觞的经典样式。整器以和田白玉精心雕琢而成，玉质温润细腻、洁白如脂，历经约2000年岁月洗礼，依旧光莹如新。耳杯线条简练流畅，轮廓端庄素雅，杯身光素无纹，不事雕琢，尽显玉石本身的纯粹质感。这体现了温润如玉，源于西域，又远赴东北，体现了汉代工艺的精华，也映照了汉代风骨的从容。

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唐代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，出自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，器形规整，双耳舒展，通体以银为胎，采用鎏金錾花的方法制成，工艺繁复考究。器物内外满饰鱼子纹地，细密精

巧。内底中心刻椭圆形蔷薇式团花一，内壁装饰折枝花四株，枝繁叶茂，富丽饱满。两端各有莲座一个，站立着相对而立的鸳鸯。外壁两侧双耳下各装饰一只站在莲瓣上的鸳鸯和鸿雁。双耳上篆刻小团花，四角点缀纹饰。花鸟相依，两两相望。整器繁而不乱、华而不俗，线条婉转流畅，鎏金之处熠熠生辉，充分展现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精湛技艺。盛唐之时，上巳节盛况空前，曲江池畔游人如织，宴饮不绝，这件华丽羽觞，想必曾在曲水之间浮泛流转，见证了大唐长安的繁华锦绣。

从楚漆器的灵动、汉白玉的温润到唐银器的华贵，穿越岁月长河留存至今的小小耳杯，曾盛满宴席雅集上的清醇美酒，定格了曲水流觞的风雅诗意，也沉淀着中国传统文化那深厚绵长的文脉底蕴。（据《中国文化报》）



西汉漆木彩绘三鱼纹耳杯。



汉白玉耳杯。